



ISBN 978-7-301-22527-1



9 787301 225271 >

定价：59.00元

思想的时差

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

张柠 董外平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张柠,董外平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ISBN 978-7-301-22527-1

I. ①思… II. ①张…②董…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838 号

书 名: 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

著作责任者: 张 柠 董外平 编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527-1/I · 26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0.25 印张 45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

张 健

营造良好的世界文化生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对话与交流,借以实现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对的共通性,由于其包含在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当中的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对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由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可读性和极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它的国际传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和”。为了“和”,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在这种文化看来,绝对的“同”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和”。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间互荣共生的时代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文学因此而成为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学之一,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学的思考因此而成为人类思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文学及其对于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保证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通过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让世界更多的人群能够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做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重大而崇高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中国大陆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近年来一直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切实的努力。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并且从2009年开始实施“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计划。其

旨归有二，一是希望站在民间和学术的立场，通过与国外教育、学术机构中有识之士长期有效的合作，在海外直接从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状态和样态；二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当中为本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增添新的契机、新的视域和新的活力。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除组织召开跨学科跨界别的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出版发行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重要新作及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国内编辑出版著名英文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发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海外文情报告以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后续的大型项目，即分批出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我相信，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国文学的当代风采，有利于建构世界文学中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和调整；有利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应该是重大而深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跨学科、跨界别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好；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现已正式出版四期，面向全球发行，在西方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编辑、出版商、发行商、文学爱好者、汉语爱好者当中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列入“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作品和作品集已经通过了论证和审定，其版权协议、翻译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完成英译以后它们将由美国方面的出版社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海外文情报告和英译的国内学者论文集中的一部分亦已进入到付梓出版的阶段。由于中外双方的精诚合作与国内的多方支持，计划终于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初步的实绩。

但另一方面，三年多的传播实践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项事业的高度复杂

性和它特有的难度。文化、制度、社会现实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海内外之间多方的沟通与磨合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超越实务层面的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是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崇高的事业无疑又是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精力、智力和心力的。究竟应该如何去遴选作品,才能表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的独特神韵和真实风貌?才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怎样做,才能保证乃至提高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应当如何从发展和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趣味,去看待中国本土的文学及其研究的传统和独特性?如何理解和对待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海外传播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源,提升高学养、有神韵的翻译能力?如何更有利于海外出版物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凡此种种,显然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思考。人类崇高的事业必然是有思想的事业。我们需要来自多重视角的洞见与卓识,我们期待更多同道在智力和学术上的跟进。而这也成为我们设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初衷之一。

当然,这套书系的创意,绝非仅仅来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实践性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它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抱负,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历史趋势、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同样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经进入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族群互动交流的新阶段。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日益频繁而且日见深化,中国大陆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悄然融入世界文学和国际学术的广阔天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缺少不了中国。西学仍在东渐,中学正在西传。在一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当中,如何发展和看待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早已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的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这四者已经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

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世界性格局正在由此而形成。

在这种背景之下去讨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然是离不开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特别是当“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人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新“现实”的时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内涵、功能、方法、层次、意义和其所适用的范围显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并非今天才有，但在过去，它们明显属于一种边缘性的附加部分，而今，它却成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丰富和拓展。这种丰富和拓展要求我们在理念观念、认知内容、思想方法、研究范式、传播方式、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态度关注和引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这些历史性的新变化。

世界性的格局，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实际包含了外化和内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其“外化”，是指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在国际上的传播；其“内化”，指的是发生在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内部的自我调整与优化。这种自我调整与优化最为根本的内驱力当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显然又是同域外文学及其学术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文学、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向外的传播及其反馈密切相关。外化和内化应该是国际化问题当中相互依存、交相互动、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向外传播，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调整、建设与优化。

但问题是，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外化”往往遮蔽了“内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些人看来，所谓“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本身实际上不仅是既定的而且是恒定的，所谓“外化”或“涉外”，无非是要把这些既定、恒定的东西以一种既有的方式“向外”传播出去而已。殊不知，传播即交流，而交流从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的双方乃至多方或早或迟、或显或隐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情况亦会如此。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学固然依旧是“中国文学”，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了“他者”理解

的、打上了某种“他者”印记的“中国文学”。这种情况反转回来势必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土原生的中国文学。在一种世界性的格局之下,“外化”和“内化”、“涉外”和“涉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论是就传播的主体、客体、中介,还是就传播的环境、机制、动力而言,都会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多层多向互动的转化过程。对于这一复杂的转化过程的理性总结和系统研究,不仅会直接推进海外传播的实务,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和“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不可忽视。我们应当看到在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所提供的反馈性影响,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外化”,同时也是为了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进一步“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国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文学及其研究的情况和国外大学相关机构的学科科研情况。尽管我们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在文学及其研究方面有着丰富而成功的经验,我们无须也不会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作为“他者”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有选择地借鉴的。在文化和学术跨地域、跨族群、跨语言的交流与传播当中,“差异”的积极意义有时或许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有了“差异”才会有“差异”与“差异”之间的互识、互动、互补、互融、相生,才可能生成人类文明多元而和谐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其中的一个带有交叉学科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这一由中国文学与传播学两个基本学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耦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就目前的情形看,已经具有了可持续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尽管它在短时间内还不大可能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我相信,经过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随着研究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积淀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它最终是完全可以建构起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愿我

们“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陆续出版,对于加快这一学术发展的进程能够有所助益。

我们希望这套研究书系能够提供一扇了解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基本状况的窗口,打造一个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问题的多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很显然,这套书系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终结性的统一结论,但却可以提供一次理解、尊重、包容、借鉴乃至超越彼此间差异的新的可能,让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这种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而展开的、“和而不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多重对话与往复交流当中,获取新的启示、新的灵感、新的兴趣、新的话题和新的动力。《论语》有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书系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内外更多朋友的关注,同时也希望海内外有志于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同道们,不吝赐教赐稿,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项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

2012年7月29日

序 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风度

张 柠

一

我们之所以编选这样一本文集,不仅仅是因为它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的集体项目之一种,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应该承担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理由是文集所选的文章,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海外学者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特殊的观察视角所进行的研究和评价,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他们的声音总是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走向。

海外学者每一种新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出版都能掀起一股旋风。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改变了中国现代作家原有的评价格局,之前那些被极力赞颂的左翼作家遭到质疑,连被奉为“祖师爷”的鲁迅因其作品的某些左翼倾向也受诟病;同时,具有所谓“资产阶级情调”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却被视为 20 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夏志清的评判标准来自英美的“新批评”,十分强调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标准,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标准大相径庭,暂且不论夏志清的“新批评”是否也如某些论者所言怀有另一种政治标准,但是他所推崇的作家现在都已被大家认可,“张爱玲热”、“沈从文热”到如今都未消退。夏志清注重文学内部研究的方法,也改变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政治功能不再是评判文学的唯一标准,一批奉行艺术品格的批评家争相出世,这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和阅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夏志清之后的李欧梵、王德威不仅继承了夏氏传统,且在批评实践

中有新的发展。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秉承夏志清“新批评”、“感时忧国”的学术精神,深入挖掘出鲁迅丰富的文学和心灵世界,同时也超越了夏志清对于鲁迅的偏见。李欧梵在国内影响最大的要属他的“现代性”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1996年在香港出版的《现代性的追求》引起了国内学者一片喧哗,国内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蔚然成风,一时间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言必“现代性”,造成了中国学术界一片混沌,谁都在说“现代性”,但谁也说不清何谓“现代性”。李欧梵为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现代”视野。李欧梵的研究从文学的内部转向外部,这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有出色的表现。《上海摩登》堪称一部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范本。这本书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之后国内有关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剧增。王德威在国内的出名更富戏剧的张力,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令学界为之一愣,王德威的观点几乎颠覆了长久以来所奉行的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五四”的论断,他认为晚清小说蕴含某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如大家所言在完全断裂中另起炉灶。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国内关于现代文学的“起源论”和“断裂论”,使得一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域向“五四”以前延伸,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传承关系成为学界一大热点。王德威学贯中西,中国文学传统使他的批评有如汉赋一般流转、雅丽,读他的小说评论就像在欣赏一篇美文,同时训练有素的西学使他在阐释中国文学时视野更开阔,但是王德威并不拘泥于各种时髦的西方理论,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应用自如的研究方法。王德威恪守“新批评”传统,注重对文本细部的蛛丝马迹的阐发,时常能够在文本细部的考察中发现人所未及的现象。从陆续在大陆出版的《想象中国的方法》、《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等著作中可以看出王德威一贯的文学立场。

第三代海外学者在各种西方理论的熏陶下显得活力十足,他们各自受一种或几种西方理论的影响,然后把它们熟练地运用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比如唐小兵、孟悦的“再解读”,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阅读政治”,均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第三代海外学者把当下西方最前沿的理论及研究范式带入国内,一方面使日渐沉闷的20世

纪中国文学研究重焕光彩,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众多新的思路和方法。以“再解读”为例,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十七年”文学一直存在某种不是偏见的偏见,即“十七年”文学没有可研究的,简单地将一种历史地存在着的文学形态打入冷宫。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在国内出版后,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纷纷把目光转向“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一时间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如火如荼。“再解读”提供了一种从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的范例。当然,第三代海外学者对国内文学研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例如导致一些学者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第三代海外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充分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而国内许多学者盲目追求各种时髦的理论,不加消化地就套用在中国文学上,给人“食洋不化”的感觉。

二

下面我准备以海外学者的“张爱玲研究”为例,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思路和风格。夏志清 1957 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夏济安主编)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两篇评论,超越了此前写得最好的、傅雷关于张爱玲的评论。这两篇文章收入 1961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①,成为第 15 章的主干。夏志清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专章讨论张爱玲的生平和创作,并使张爱玲超过鲁迅成为个人章节占据篇幅最大的作家。夏志清的研究,涉及张爱玲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所有重要作品,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到《秧歌》和《赤地之恋》。他不但将张爱玲提到与鲁迅比肩的位置,还认为张爱玲与英美文学界一些著名女作家相比也不逊色,有些地方甚至还要高一筹。此外,他将微观细读的眼力(对 20 世纪新批评的方法的运用),与宏观

^① 该书 1961 年初版为英文,1979 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繁体中文版,1985 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繁体中文版,2001 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2005 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简体字版(有增删,张爱玲一章繁体字版为 38 页,简体字版为 27 页,增加了夏志清新写的序言和刘绍铭和王德威的评论)。

判断的眼界(中外文学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相结合的方法,已经为张爱玲研究界所熟知。

夏志清的研究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文学专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1906—1980)。普实克1962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严厉批评夏志清,认为他的这部著作的特点是“教条式的褊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夏志清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作为回应^①。我不准备详细讨论两位教授的观点。但我喜欢普实克教授开门见山的态度,因此我也开门见山:我对普实克教授所谓系统科学地“发现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和趣味表示怀疑,并认为他给夏志清教授所扣的帽子,特别是“教条式的褊狭”那顶帽子,戴在他自己头上更合适。我并不是说夏志清教授的研究方法是唯一有效的,他那种以“审美批判”替代“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值得商榷。但夏志清的研究撕碎了此前的“文学史”貌似严谨科学的逻辑结构,打破了普实克所附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外加丁玲树理赵”的格局,唤起了人们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它至少让我们重新开始面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面对曾经被删除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面对被肯定的作家那些被忽视的作品(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之外还有《猫城记》)。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起,共同保持了“文学地形图”的完整性。一部“小说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很可贵了。试图简单粗暴地否定它的人,结果只会被它自身的反弹力击倒。

刘再复对夏志清的批评,比较客观平和。他肯定了夏志清对张爱玲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比如“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等,同时提醒要从“鲁迅神话”的制造中吸取教训,避免再

① 两文收入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郭建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这本论文集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书名《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李欧梵的序言不变,没有附录部分)。

造“张爱玲神话”。不过我认为,“张爱玲神话”即使存在,也与“鲁迅神话”不同,这是民间“造神”与官方“造神”两种“造神运动”此消彼长的结果。此外,刘再复对夏志清的一些具体论述也有质疑。比如,他不同意夏志清用“忠实而深厚的历史家”和“强调优秀与丑恶对比”的道德感来概括张爱玲早期中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刘再复发现,张爱玲早期创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对历史和道德的超越。刘再复借用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学的两大类型,即《桃花扇》型(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和《红楼梦》型(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之中,张爱玲是继承了《红楼梦》传统的,是超越了“政治、国民和历史”的,而显示出其“哲学、宇宙、文学”的特点,还有“超越空间之界(上海、香港)和超越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①。但刘再复最终也被逼入了“排座次”的思维中,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进行取舍。刘再复认为,早期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的成功,在于其“超越性”,后来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张爱玲没有将“超越性”贯彻到底。假如我们同样用“超越性”的标准来要求鲁迅,那么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具备,反倒显示出其“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特征,那么我们如何得出鲁迅是“把天才贯彻到底”的作家,张爱玲是“夭折的天才”的结论呢^②?此外,我以为张爱玲的作品并不缺乏“历史感”,她只不过是將这一问题转化了,在词语和意象、语法和修辞层面,而不是在一般的叙事层面,将这一问题转化为现代美学问题。对这一转化过程的意义的评价,仅仅凭艺术感觉是难以说清的,需要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分析。在这一点上,李欧梵的研究开创了新路。

李欧梵的“张爱玲研究”新见迭出,相关论文收入《苍凉与世故》一书^③,其中包括《张爱玲:沦陷都市的传奇》和《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这两篇著名的论文。他的研究是从夏志清所说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入手,方法却是全新的。他率先将“现代性”观念引进

①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6—38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张爱玲研究”。他用“现时感”（现代时间哲学视角）替换了“历史感”（传统历史哲学视角），避免了传统诗学对现代作家的苛求；用“现代都市空间”分析取代了传统文论中的“环境”研究，使“现代感性”问题得以突显。当这些问题被置于中国文学传统和语言传统之中的时候，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物（商品），景观（现代都市）、时间（命运）所引出的荒凉感，破碎感，不安感，就有了发生学依据。李欧梵还是从各个不同角度（照片、电影、时装等现代器物）介入张爱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将张爱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和高度。李欧梵并不急于直接讨论张爱玲的文学史定位问题，而是将问题置于中国现代总体文化意象（时空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演变的逻辑中。他的研究，除了理论上的开创性和思辨色彩之外，还有很强的写作色彩，文体优雅流畅。

王德威的张爱玲研究，是继夏志清和李欧梵之后的又一代表。他试图将张爱玲的创作，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性”潮流之中加以考察。王德威指出：“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主流一向以革命与启蒙是尚。……出现各种名号的写实/现实主义，要皆以铭刻现实。通透真理为思辨的基准。……（张爱玲）以‘流言’代替‘呐喊’，以重复代替创新，以回旋代替革命，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学。”^①王德威称之为“重复修辞学”。这种修辞学“在一广义的写实/现实主义论述上，更显露五四以来‘文学反映人生’的教条”^②。王德威还引入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新的理论资源，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解剖。王德威认为，从《金锁记》到《怨女》，同一个故事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了四次改写，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是对“始原创伤”的治疗和救赎；从叙事学角度看，是对现实的不确定性的着迷，是对“现实”进行多元再现的冲动，借以消解那种确定无疑的“现实观”。王德威还求助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观点：作家对现实的再现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封不动地拷贝现实，将现实视为“圣像”；

① 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见《落地的麦子不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② 王德威：《此怨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见《落地的麦子不死》，第23页。

二是将世界视为海市蜃楼,将其作幻影般的呈现^①。张爱玲对第一种方式的运用能力是高超的,更重要的在于她的第二种能力,而且还能“穿梭于此二者之间,出实入虚,终以最写实的文字,状写真实本身的运作与权宜”^②。张爱玲通过其“重复修辞学”所展现的如梦幻泡影般的“现实”,是对传统“现实主义”世界里,那种没有疑问的“圣像”般的“现实”的颠覆,使得那些自以为是的最高等级的“现实”变得可疑起来。王德威的研究还有另一指向,就是着迷于“张派”写作,在两岸三地的传承关系中,把张爱玲研究引入一个新的领域。

就张爱玲研究而言,海外学者中还有一些值得提及的优秀研究成果,例如,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③一书的第三章《现代性与叙事:女性的细节之处》,对被宏大叙事所删除的日常生活层面的乃至心理学层面的“细节”的再发掘;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④一书中的第二章《状写中国:想象的身体与寓言的荒原》,从“现代寓言”和“生活废墟”的角度对“苍凉美学”的研究;孟悦的论文《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将张爱玲的审美经验和“新传奇”,放到新旧中国交替时代“现代性时空观念”萌发过程中进行哲理性研究^⑤;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将张爱玲的文学经验的发生学问题,置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化总体背景之中加以探讨;此外还有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中的相关章节,等等。

问题不在于对张爱玲的“否定”和“肯定”孰是孰非,问题在于“肯定者”如何将肯定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总体逻辑之中(而不是凭个人

① 王德威:《此怨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见《落地的麦子不死》,第9页。

② 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与衍生的叙事学》,见《落地的麦子不死》,第23页。

③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1年,汉字简体版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④ 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汉字简体版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⑤ 该文初刊于《今天》杂志1992年3期,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的审美趣味)；或者说凭什么否定“否定者”已有的文学史逻辑。在这里，单纯的“细读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不过是问题发生的起点，因为持不同观念的人对细节的取舍是不一样的。将问题纳入“观念史”研究之中，是我在《张爱玲与20世纪中国的隐秘心思》这篇5万多字的长文（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5期，收入《感伤时代的文学》，新星出版社，2012年）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上述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我讨论问题的起点和前提。如果没有他们的成果为基础，我的文章是不可想象的。

三

以上粗略地描摹了一下海外学者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方面意在说明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强调海外研究对国内研究所起的借鉴、推动、创新的作用。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对自身的认识总会存在某种思维定势和自以为是的偏执，这就需要一个有距离的旁观者的冷静声调。当然，并不是每一种声音都是冷静客观的。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就有些鲁莽，尽管他对此有过自己的解释，但他指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对此，我有过专文讨论^①。“顾彬事件”不只是一个纯学术判断问题，它所折射的是有关“本土/异域”、“自我/他者”的复杂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故步自封抑或唯外国论都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清醒的态度依然是“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球化”语境需要对话、交流与碰撞，“顾彬事件”尽管有些戏剧性，但它积极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对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态度首先应该是虚心地借鉴学习，再就是有效的交流与互动，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更需

^① Zhang Ning: "Garbage or Gold: Two Extreme Assess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Winter/Spring, 2011.